

中国高等教育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杨之岭 (Zhi-Ling Yang)

林 冰 (Bing Lin)

苏渭昌 (Wei-Chang Su)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 国 高 等 教 育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杨之岭 林冰 苏渭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高等教育

杨之岭 林冰 苏渭昌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 字数: 245 千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 000

ISBN7-303-00068-2/G·55

定价: 2.75 元

编 者 说 明

《中国高等教育》原于1986年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教育办事处的要求，作为该组织的高等教育地区合作研究项目“高等教育国家案例调查”的一个部分，为今年年初在孟加拉国召开的亚太地区高等教育研讨会而准备的国家报告。由于各方面的要求，我们决定将中、英文两种版本同时出版。

这个报告的目的是向亚太地区各国的同行提供有关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情况，包括它的发展概况、现状、存在问题，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希望通过这个报告，可以加强这个地区各国同行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合作研究，改进各国的高等教育。

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教育办事处的要求，这个报告的内容分为以下十二章：第一章，发展概况；第二章，指导方针；第三章，培养目标；第四章，领导管理体制；第五章，经费；第六章，设备；第七章，校舍；第八章，教师及学生；第九章，教学与科学的研究；第十章，学校与社会；第十一章，评估；第十二章，展望。

这个报告是在广泛阅读有关文献资料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而写的。在整个过程中，得到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教育办事处及中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的支持和资助；并且得到中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前任主任、原教育部副部长高沂同志的关怀和支持。参加这个合作研究项目工作的有王欣、杨桦、丛立新、孙秀兰、王明朋和夏宁等同志。陈友松教授对这个项目一直是很关心和支持的。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了各有关高等院校的支持和帮助。值得提出的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育学院约翰·柯根教授以及被誉为“中国的好朋友”的玛丽·西希莉亚女士，作为外国

读者，仔细阅读了文稿，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对以上各方面的支持、资助、指导、关怀、帮助和合作，我们在此一并致谢。

编者

一九八七年十月

目 录

一 发展概况.....	(1)
二 指导方针.....	(8)
三 培养目标.....	(15)
四 领导管理体制.....	(23)
五 经费.....	(31)
六 设备.....	(34)
七 校舍.....	(41)
八 教师及学生.....	(48)
九 教学与科学研究.....	(59)
十 学校与社会.....	(69)
十一 评估.....	(80)
十二 展望.....	(86)
附 录.....	(217)
主要参考资料	(311)

一 发 展 概 况

近代类型的中国高等教育起自 19 世纪下半叶。但将教育按程度区分，以传授高深学问或以培养高级官吏为目的的高等教育，中国早就有了。迄今已有三千余年悠久历史。

“右学”和“稷下学宫”

中国的高等教育，源渊流长。早在公元前十五、六世纪的殷商时代就有了大学，名叫“右学”。它既是进行教育活动的场所，又是宫廷进行祭祀、王公大夫从事政治活动的地方。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大学。公元前 5 世纪末至公元前 3 世纪，中国已有了私立大学。孔子就是中国私立大学的创始人之一，先后有弟子 3 千人。战国时代的齐国，在稷门下设立了一所私学，叫“稷下学宫”，弟子数千百人，最多时有数万人。公元前 124 年，汉武帝设立太学，这是当时正式的大学。东汉末年太学生曾达到 3 万人。

最 早 的 专 科 大 学

南北朝时期，中国已有分科大学的萌芽，至唐朝初期，由于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统治者尊重知识，各级学校达到空前昌盛和完备的程度，已有律学、算学和医学等专科大学，* 这种专科高等学校，比较欧洲的实科学校大约要早一千年。所以，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建立高等教育机构最早的国家之一。当时，日本、朝鲜、波

* 唐朝专科学校的入学年龄，一般为 14 岁至 19 岁，律学学生限 18 岁到 25 岁。算学以 7 年为限，学生分两组：一组似古典数学专业；一组似应用数学专业。医学分四门：医学、针灸、按摩、咒禁，学程分 7 年、5 年、2 年几种。

斯等地派来唐朝留学的人数亦相当多，如日本派遣的遣唐使有 19 次，每次随行的留学生、留学僧有十余人，多的时候为二、三十人。又如公元 840 年(唐文宗开成五年)，学成归国的朝鲜半岛上的新罗国学生一次就达 105 人之多。

从京师同文馆到西南联合大学

中国近代高等学校的出现是在鸦片战争(1840 年)之后。中国自己办的第一所近代专科学校是京师同文馆，建立于 1862 年，是清廷洋务派首领恭亲王奕訢筹办的。这所学校主要学习西方语言，培养翻译人才，同时开设有近代自然科学课程。中国近代第一所具有大学雏型的学校是天津中西学堂头等学堂(1902 年改名为北洋大学堂，即现今天津大学的前身)，它是由中国的大资本家盛宣怀于 1895 年奏议并筹资兴办的。1896 年，盛宣怀又筹办了著名的南洋公学(即后来设在上海的交通大学)。南洋公学设上院、中院、外院、师范院。上院即大学，中院即中学，外院即小学。由国家在京师开办的第一所正规型的高等学府就是京师大学堂(即今北京大学前身)。它建于 1898 年，是维新运动中诞生的。负责兴办京师大学堂的是清末政府的第一任管学大臣孙家鼐。

1903 年清政府正式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学制系统。其中明文规定高等教育机构有大学堂、高等学堂、高等实业学堂、高等政法学堂及优级师范学堂。大学堂分本科、通儒院(即今研究生院)和预科。本科分设八科，科下再设若干门，如：

1. 经济科，分十一门；
2. 政治科，分二门；
3. 文学科，分九门；
4. 医科，分二门；
5. 格致科，分六门；
6. 农科，分四门；

7. 工科，分九门；

8. 商科，分三门。

修业年限为3至4年。通儒院不定年限。预科3年。

民国政府于1912年成立后，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期间高等教育也有一定的发展。据1947年统计，中国已有高等学校202所，其中国立大学31所，私立大学22所；国立独立学院23所，省立独立学院21所，私立独立学院31所；国立专科学校20所，省立专科学校30所，私立专科学校24所。从1912年至1947年36年间共培养了21.08万名大学生，还有一万名从欧、美、日留学回国的专家。^①

中国近代大学同样具有优良的办学传统。对近代中国大学进行大胆改造最有名的是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1917年，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倡民主与科学，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起了进步作用。此外，著名科学家、教育家竺可桢主持浙江大学校务期间，提倡求实精神，也取得卓著成绩。抗日战争期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迁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出了不少人才和成果。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博士就是当年西南联大学生。还有陶行知先生在重庆、上海创办的社会大学，张伯苓先生创办的南开大学，爱国华侨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潘序伦先生创办的私立立信会计学校，唐文治先生办的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都颇有成绩。

值得提到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一些传教士也相继在中国办起了大学，被称之为教会大学。这些大学由于经费充足，设备较好，又引进了西方的教育制度，因此对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也起了相当作用，在这些学校中出了不少人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共有21所教会大学，如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金

^①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1984年第1版，第86页。

陵大学、震旦大学、辅仁大学、岭南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这些教会大学相继改为公立大学，成为新中国高等学校的组成部分。

从清末建立近代学校到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军阀混战，国民党政府不断制造内战，加上帝国主义的侵略、破坏，使得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基础十分薄弱、落后。

从湖南自修大学到抗日军政大学、华北大学

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基础之一是中国特有的革命大学。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为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组织革命力量，开展革命运动，先后办起了新型的革命大学。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大地上办起了第一所新型的革命大学——湖南自修大学。上海大学在瞿秋白等人的影响下也成为革命的大学。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为建设和保卫根据地的需要，江西苏区办起了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等。抗日战争期间，为培养大批军政干部的需要，在根据地建立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自然科学院、延安大学、华北联合大学等。抗日军政大学的创立和发展，为创办无产阶级新型的革命大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解放战争时期，为适应解放区迅速增长的对于各科人才的需要，又逐步办起了华北大学、华中建设大学、中原大学等一批人民革命大学，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学校通过不同方式开始向新型正规化大学过渡，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建立和对旧大学的改造作了干部和经验的准备。

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1016 所大学，411.02 万名大学毕业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中国高等教育事业走上社会主义轨道，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新中国诞生后，人民政府首先接管了全国的高等学校，从帝国主义者手里收回了教育主权，有步骤地对旧有高等教育事业进行改造。取消反动党团组织，取消国民党“党义教育”和“训导”制度。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建立政治思想工作制度。1952年至1953年，根据国家经济建设需要，进行了全国范围的院系调整，改变了旧大学的不合理布局和结构，增加了工科、师范的比重。

从1953年开始，执行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高等教育逐步走上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轨道。

1958年及以后的一、两年间，在“大跃进”的影响下，高等教育的发展一度过急过快，以致质量有所下降。

1961年认真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高等教育得到稳步发展，教育质量明显提高。特别是在总结经验基础上，制定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共六十条，又称《高教六十条》。纠正了一些“左”的做法。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高等教育事业受到严重摧残。高等学校由1965年的434所减少到1971年的328所，被撤106所，其中原有的6所政法院校全部撤销，原有的18所财经院校有16所被撤销，原有的45所农林院校撤销了17所，其中有23所被迫搬迁共45次。被撤销的这些院校，校舍被占作他用，图书资料散失，学校干部、教师调走改行。没有搬迁的院校，也因长期停课，打派仗，武斗，校舍、仪器设备遭到严重破坏。

由于“文革”中高校停止招生，直到1970年才开始试点招收工农兵学员，这些学员大多数只有相当中初甚至还不到初中文化程度。学制由文革前的4至6年缩短为2至3年。因此，人才质量大大下降。从1966—1967年至少为国家少培养100万名合格的大专毕业生和200万名以上的中专毕业生。

高校师资队伍也受到严重摧残。1965年全国有教授、副教授7800人，至1977年已减少到5800人，其中有的就是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的。卫生部直属的14所高等医学院校674名教授、副教授中，受诬陷、迫害的就有500多人。^①这一时期，世界多数国家为适应经济技术发展，尽力变革和加强高等教育，取得长足进步。中国高等教育却走了弯路。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地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批判了轻视教育、轻视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高等教育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从1981年至1983年，普通高等学校增加130所，共毕业92.96万人，专任教师也增加5.6万人。1983年普通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13,064人，比1980年增加10,000人，增长3.4倍。在校研究生达30,559人，比1980年增加12,831人，增长72.3%。从1981年起，我国开始实施学位制度。1981年至1983年，共授予29人博士学位，授予18,143人硕士学位。^②

尽管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曲折，走过弯路，但是，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仍然取得了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巨大成就。

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已由1949年的205所增加到1985年的1016所，其中大学、学院（本科院校）有574所，专科学校有324所，短期职业大学有118所，另有经批准正在筹建尚未招生的院校52所。在校学生由1949年的11.7万人增加到1985年的170.31万人，其中本科生112.31万人，专科生58万人。

30多年来，中国成人高等教育几乎从无到有。1985年各类成人高等学校已达到1,216所，另有591所普通高等学校举办高等

^①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第83页。

^② 《中国教育成就(1949—1983)》，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1984年第1版，第50页、124页。

函授、夜大学。在校学生达到 172.51 万人，其中本科生 20.85 万人，专科生 151.66 万人。1985 年各类成人高等学校本科招生 78.78 万人。^①

从 1949 年至 1983 年，35 年高等学校毕业生累计数为 411.02 万人，是解放前 36 年毕业生累计数 21.08 万的 19.5 倍。^②

一个层次、门类、形式、专业比较齐全的高等教育体系已经逐步形成，并在不断完善。

① 根据国家教委计划司统计资料。

② 《中国教育成就(1949—1983)》，第 38 页。

二 指 导 方 针

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取得巨大的进展，是与党和政府正确的指导方针分不开的；而发生过的较大挫折，也是与当时的错误指导方针分不开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告诉我们，指导方针的正确与否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它直接影响到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和速度。

大力发展人民革命大学

解放初期，我们制定的高等教育的指导方针是比较正确的。当时，中国有两类学校，一类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根据地、解放区就兴办起来的、以短期政治训练为主的革命大学；一类是国民党政 府留下的高等学校，其中有国立的，有私立的，在私立的高等学校中，还有少数接受外国津贴的教会大学。

为了适应革命胜利以后对各类干部的迫切需要，我们曾一度大力发展了一批人民革命大学，继续以短期政治教育为主，使大批知识分子经过短期教育，迅速走上工作岗位。据统计，1949、1950年间，我国有人民革命大学类型学校50余所，共培训了三十万人左右。^① 后来一部份人民革命大学向正规化专业教育过渡，一批干部、教师也随之转入正规高等学校工作和任教。如陈毅司令员于1948年在河南宝丰创办的中原大学，随着武汉的解放而迁入武汉后，就很快办起了教育学院、政治学院、政法学院、文艺学院、财经学院等，以后就成了华中师范学院、中南政法学院、中南文艺学院、中南财政学院等学院的基础。今天这些大学的大

^① 根据教育部1950年档案资料。

部分领导干部和中层骨干都是当年中原大学的学员或工作人员。虽然向正规化过渡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国家建设的需求，但此后相当一段时期对充分发挥这类大学的作用有所忽视，也是一个教训。

对旧大学采取维持现状，逐步改造的方针

对国民党旧政权留下来的高等学校，采取什么方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解放战争初期（1946—1948年），我们曾一度未予足够的重视，以致有的高等学校中断了办学。不久，我们认识到这些高等学校都是人民的财产，广大教职员是拥护革命的，尤其是学校的教授、教员有着丰富的知识，是今后培养新中国建设人才所必须依靠的力量，因此，必须保护这些学校，保护广大人民教师。所以，在全国解放前夕，人民政府决定，对所有高等学校都采取维持现状，逐步改造的方针。除极少数由反动分子把持的学校必须予以取缔外，政府全部将它们接收过来了。原国立（省立）大学，经政府接收，发给经费；原私立大学，经费有困难的，政府给以补助。即使是教会大学，也采取暂时维持现状的方针，只要它们遵守人民政府的法令和政策，都未予以取缔。只是后来，由于某些外国教会继续侵犯我国教育主权，以停止提供经费的手段干涉我高等学内政，从1950年下半年起，政府才开始陆续收回教会大学。这是中国人民维护教育主权的正义斗争。

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改革

使高等学校从为旧政权服务转变为新政权服务，为广大劳动群众服务，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当时，我们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教育事业和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避免用粗暴的方法进行改革。

在这方面，我们的另一条经验是：注意引导高等学校广大师生学习马列主义；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使他们能比较自觉地转到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上来。这对于后来顺利地进行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起了重要的作用。

向工农开门，为工农服务

旧中国实行歧视劳动人民的教育政策，工农群众基本上被排斥在高等学校的大门之外。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提出了整个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在内）要向工农开门，为工农服务的方针。为大批工农青年进入大学提供种种方便条件，采取优待政策，同时在大学中附设工农速成中学，为他们上大学补习文化知识。这个方针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必要的。

照顾少数民族、归国华侨上学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除了汉族外，有55个少数民族。早在解放初期，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要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指示，1950年11月24日政府颁布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决定开办政治学校与政治训练班，培养普通政治干部和专业技术干部。为此，在北京设立中央民族学院，并在西北、西南、中南各设中央民族学院分院。

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华侨热爱新中国，纷纷送子女回国就学。从1949年10月至1953年上半年，回国华侨学生达1万多人，政府规定对于华侨子女入学，要实行“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政策。

院系调整

旧中国有一些高等学校办得较有特色，也培养了一些人才。但是就整个高等教育来说，由于国民党政府推行法西斯政策，摧残人才，摧残教育，高等教育的院系设置庞杂零乱，人力物力浪费严重，

整个管理工作混乱不堪。高等学校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和大城市，与内地极不平衡；师资设备分散，使用极不经济；学科庞杂，教学不切实际。为了迅速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大量培养国家急需的各种人才，一九五二、一九五三年，我国政府决定进行一项全国范围的院系调整。如工科院校，经过这次调整，招生数量增加了一倍。今天中国比较著名的一些大学，如北京钢铁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华中工学院等就是在这次院系调整中新建立起来的。从全局看，这次院系调整是有成绩的，奠定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基础。但是，也有一些缺点，如将一些办得较有基础的文、理、工、医、农综合大学撤消了，如浙江大学、四川大学等。今天看来，如果能保留几所理、工、农、医师范各类系科皆有的综合大学，还是有益的，是符合现代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我国在学习外国经验上，有些片面性，对欧美的经验缺乏辩证的分析。经验证明，对任何一个外国的经验，都不应采取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态度，必须取人之长，为我所用，走自己的道路。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院系调整后，中国高等教育稳步地向前发展，教育质量有明显提高。但是从1957年以后，在高等教育的指导方针上出现了一些偏差。1957年在高等学校开展反右派运动，一些著名教授、学者被错划为右派。也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1958年，党和政府提出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工作方针。这个方针有不够全面和不够确切的地方，容易使人片面地理解为教育就是为政治服务，就是要跟着政治运动转，成天搞阶级斗争，忽略教育与经济、与文化科学发展的密切关系，忽略教育本身培养人的职能。正是在1958年前后，我们在这方面出了偏差，高等学校的运动接二连三，生产劳动也搞得过多，影响了正常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教育质量下降了。现在看